

从满文档案和美术史资料看清朝与哈萨克诸部关系史——以《哈萨克贡马图》源流为中心

郭文忠

内容提要:《哈萨克贡马图》是清朝与哈萨克诸部关系史上最重要的宫廷纪实画作,源于哈萨克右部(大玉兹)乾隆二十三年正式归附并遣使朝觐贡马。本文通过满文档案与美术史资料的结合,讨论郎世宁画《哈萨克贡马图》源流与乾隆帝如何看待哈萨克右部归附事件,对哈萨克右部归附、遣使、贡马过程做一综合考察,进而探讨这一画作反映出的政治与文化双重意涵,认为乾隆朝君臣将左、右哈萨克部纳入藩属体系后,通过系统整合历史资源和盛世文化,在宫廷画作中展现出清朝上承汉唐旧疆、下启后昆新识的全新西域叙事与国家意象。

关键词:《哈萨克贡马图》;满文档案;清哈关系;大宛马歌;郎世宁

DOI:10.13318/j.cnki.msyt.2018.03.010

引言

贡马图是中国古代宫廷绘画的重要题材,其意涵在于表现中央与边疆之关系。从早期记载如“周穆王八骏”、汉“武帝求天马”, [1]到唐《昭陵六骏》石刻侍者牵引“飒露紫”、[2]宋《李公麟五马图》绘“人牵一马”,历代中央王朝逐渐开始以雕塑、石刻、绘画等形式展现皇权与异域神骏之关联,至元《拂朗国贡马图》,首次在构图上出现异域使者向中国皇帝贡献名马的完整场景, [3]最终形成以得获“渥洼神骏”“大宛天马”为当朝盛事的宫廷绘画传统。清朝在继承传统贡马图题材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经《准噶尔贡马图》[4]为过渡,尤体现于意大利人郎世宁[5]奉乾隆帝谕旨所画手卷《哈萨克贡马图》。[6]该作描绘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之前,中亚哈萨克部落首领所遣使者,在京郊行宫向乾隆帝贡献名马的历史场景,卷末书有御笔《大宛马歌》[7]等四篇,是清朝与哈萨克诸部关系史[8]上最重要的宫廷纪实画作,也是中国历代贡马图题材的巅峰之作,展现出清朝上

承汉唐旧疆、下启后昆新识的全新西域叙事与国家意象。

本文要讨论的不是西洋传教士所画贡马图本身体现出的绘画技法与中西交流意义,这些重要问题已有相关研究。[9]本文要讨论的,是指以《哈萨克贡马图》为主, [10]哈萨克《八骏图》《云锦呈才图》为辅,——同为郎世宁所画且都题有御制《大宛马歌》的“三图一歌”这一整体。这些图文结合的美术史资料同时形成、关联紧密、不可分割,反映出清廷对清哈关系渊源及历代中央王朝与西域关系的独特认知,提供了与传统文献迥异的观察视角。学界以往虽有所涉及, [11]但仍有讨论余地。探索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不但可作为清代边疆民族史、美术史研究的有益补充,还可凭籍满文档案、美术史资料与传统史学方法的结合,解决相关研究中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

一、哈萨克右部归附清朝及贡马考

乾隆朝时期,西域名马为乾隆帝所喜爱,哈萨克马匹被认为是

产于汉武帝求“天马”之“大宛故地”而更受珍视,在御制诗内屡屡提及,如“今之哈萨昔大宛,峽山神种古所传”。考察纪实画作《哈萨克贡马图》创作缘由,应首先探究该作表现出的哈萨克左、右部归附献马史实,以及乾隆帝降旨绘制意图。

乾隆二十二年(1757)哈萨克左部首领阿布赛正式归附后,左部阿布勒比斯、霍济伯尔根、喀拉巴拉特、右部额尔类等五首领先后归附献马,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哈萨克右部[12]三首领归附献马,成就哈萨克左、右部全部归附清朝之盛事,哈萨克八首领所献骏马又恰足八骏之数,清廷上下认为:“自此远近各部臣仆,享万年永安,太平安宁之福。”《哈萨克贡马图》及“三图一歌”整体之创作恰好紧随西哈萨克归附清朝这一历史节点,笔者认为这一系列事件是促成这一宫廷书画作品整体产生的直接原因。

西哈萨克归附,发生于参赞大臣富德前往塔什干追捕准噶尔贵族哈萨克锡喇,适遇西哈萨克与塔什干回人相互征战,因而遣员令两



郎世宁 《哈萨克贡马图》手卷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底 宣纸本设色 45.5×269 cm 法国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

部息战，西哈萨克汗阿比里斯与众军事首领（巴图尔）等随即遣使归附。富德满文奏折奏报甚明：

奴才富德携军营大臣等、官军谨奏。西哈萨克阿比里斯，塔什干回子和卓莫尔多司马西、图尔占等，带领全部哈萨克、回子归附，已成圣主阿勒巴图，贡马遣使。为跪拜恭贺故，伏思西哈萨克、塔什干回子，皆极远部落之人，从未有纳贡遣使中国之处。现因圣主仁化达于四方，兵威远播之故，极边之哈萨克、回子等，带领全部部众，恭顺前来，成圣主阿勒巴图，诚心附入，贡马遣使，此皆早为圣主睿算，天威达于边末之故。现剿灭准噶尔，安辑哈萨克左部，收拢布鲁特，西哈萨克、回子等皆已归附。自此远近各部臣仆，享万年永安，太平安宁之福。奴才等不胜喜悦，带领官员兵士，跪拜恭贺圣主。为此谨奏。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初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八月初四日。[13]

富德将西哈萨克等部贡马送往京城详情，所报如下：

此次经布鲁特，往西哈萨克搜擒哈萨克锡喇时，布鲁特奇泰鄂托克卡拉波托比向圣主进马一匹，

西哈萨克阿比里斯汗，图里拜巴图尔等向圣主进马三匹，使者卓兰进马一匹，又向奴才以相见伯勒克礼物为名各送马一匹。奴才皆自所备带来蟒缎、缎匹内，相机回送。以上马匹已收悉，与使者同往已不可行，欲另派人送往时，巴图济尔噶尔、胡勒奇、玛瑞等告称，我等皆陆续向前往哈萨克官军寄带银两什物，各购得马二、三匹不等，自所得内每人选马二匹，欲进贡圣主，望替我等转送。等语。是以，奴才自所得马匹内，虽不得甚多好马，惟因新附之部马匹之故，选取哈萨克马四匹、布鲁特马二匹。将领队大臣、乾清门侍卫等所进马匹，及布鲁特、哈萨克等所进马匹一同，派精干官军解送，随后出发。[14]

由此可知，西哈萨克汗阿比里斯和巴图尔图里拜共向乾隆帝直接进献贡马三匹，使者卓兰（图里拜之子）向乾隆帝直接进献贡马一匹，富德所部途中路经的布鲁特地方首领卡拉波托比向乾隆帝直接进献贡马一匹，即西哈萨克、布鲁特两部首领四人向乾隆帝直接进献贡马五匹，其中哈萨克马四匹、布鲁特马一匹。此外，因参赞大臣富德带领这支清军，以上四首领又各送给富德见面礼马一匹，因而富德得见面礼马四匹，其中哈萨克马三

匹，布鲁特马一匹。此外，随军行走领队大臣、乾清门侍卫巴图济尔噶尔、胡勒奇、玛瑞等三人，各择机购得哈萨克骏马二匹，共骏马六匹，委托参赞大臣富德代为进献乾隆帝。富德遂将布鲁特、哈萨克马内选取哈萨克马四匹，布鲁特马二匹，共六匹；官员献马全部六匹，合计马十二匹，派专人送往京城进献乾隆帝。而挑选剩余，未进献马三匹都为哈萨克马，这不一定是因为哈萨克马弱于布鲁特马，很可能是因布鲁特马数目太少，只能将两匹全部进献。因而，此行所得进献马及见面礼马十五匹内，乾隆帝得贡马、献马合计十二匹，其中哈萨克马十匹，布鲁特马二匹，挑选剩余马三匹留于军营。

要之，满文档案所记哈萨克右部首领归附贡马，与哈萨克《八骏图》后三骏存在对应关系。哈萨克右部归附献马，使《八骏图》创作要素齐备；《八骏图》的先行创作，又与“三图一歌”整体中《哈萨克贡马图》的产生直接关联，以下循此线索展开讨论。

二、哈萨克《八骏图》与“三图一歌”整体

林士铉[15]根据《钦定石渠宝笈》等文献记载，梳理西洋传教士

所画贡马图，尤其是郎世宁乾隆二十四年所画《八骏图》骏马信息，厘清此八骏皆为哈萨克各首领所贡马匹，其中有三骏为哈萨克右部所贡，分别为第六匹“明月题”，注明进贡者为哈萨克辉格尔德；[16]第七匹“雪团花”，注明进贡者为哈萨克阿毕里斯；[17]第八匹“星文麟”，注明进贡者为哈萨克图里拜。惟据林氏查访，郎世宁画哈萨克《八骏图》已不存世，仅宫廷画作记录载有所绘内容。

凭借以上满汉文档案文献对各进贡首领姓名与骏马的记载和讨论，笔者推断，“明月题”“雪团花”“星文麟”三骏即为上引富德满文奏折所称解送京城哈萨克马匹之三。依据在于，与前一年归附的哈萨克左部首领阿布赛、阿布勒比斯多次遣使不同，从连贯的满文奏折档案可见，西哈萨克汗阿比里斯与图里拜、辉格尔德三人共同遣使献马在历史上仅有这一次，其后再无共同遣使之情节，哈萨克右部阿比里斯汗亦再未出现于遣使朝觐首领名单内，[18]可知此三骏在富德此次送往京城马匹内。

西哈萨克阿比里斯汗、图里拜巴图尔、辉格勒德巴图尔所献三匹骏马的更多信息，还可从满文辞书《御制增订清文鉴》和《五体清文鉴》中得到。乾隆朝时期，清廷为哈萨克《八骏图》中全部骏马，皆在《御制增订清文鉴》中以满、汉两种文字对译命名，其后全部哈萨克八骏名又都被收入《五体清文鉴》，使每骏又都同时拥有满、汉、蒙、回、藏五种文字名称。这两部辞书所载八骏名称的对应满、蒙文释义，为本文进一步展开探讨提供了新的路径。

首先是“明月题”，其对应满文名为“saratai keire”，其对应蒙文名“saraliy keger”，意为“月亮的枣骝”，满文释义“biya i gese tosi bisire fulah ū n kuluk”，意为“有月亮一样白色额纹的红色神骏”；其次是“雪团花”，对应蒙文名“časun čayan”，意为“雪白”，对应满文名为“cabgan suru”，满文释义“der seme shayan kuluk”，意为“雪白的神骏”；最后是“星文麟”，对应蒙文名“odoliy caliyun”，意为“星星的海骝”；其对应满文名为“oduntu kailun”，满文释义为“usiha i gese camhata kuluk”，意为“像星星一样的点子神骏”。[19]哈萨克贡马除以上所列西哈萨克三骏外，还有《八骏图》另外五骏，皆为哈萨克各部首领进献。

通过以上梳理的哈萨克右部三骏被绘入哈萨克《八骏图》，及每骏多语专有名称被创制并进入钦定辞书，可明了哈萨克骏马形象被融入清代官方话语体系的情况。在乾隆帝主导的这一历史进程中，不但向前承接了汗、唐以来的西域名马传说，还向后留下清廷内苑哈萨克骏马及御制诗文、文人歌赋、传世画作中的哈萨克马匹印象，连接前后的关键，即为实际送达京城的哈萨克贡马。以下依据满文档案，列表复原《石渠宝笈》等汉文文献所未载的八骏进贡时间、地点等信息：

表一：哈萨克《八骏图》进贡情况一览表[20]

骏马名	进贡首领	毛色	高、长	进贡时间	献马地点
沃窪骏	阿布尔毕斯 [21]	浅黑色	五尺一寸、七尺五寸	22 年 6 月 3 日	额卜克特军营
歆玉骢	霍集博尔根 [22]	青白色	四尺八寸、七尺四寸	22 年 7 月 6 日	额卜克特军营
锦云骝	喀拉巴拉特	红白花色	四尺七寸、七尺二寸	22 年 7 月 6 日	额卜克特军营
苍龙骥	阿布赖 [23]	白色	四尺七寸、七尺	22 年 6 月 3 日	额卜克特军营
繡铁騊	额尔垒 [24]	黑色	五尺一寸、七尺八寸	22 至 23 年间	巴尔喀什湖东
明月题	辉格尔德	黑红色	四尺九寸、七尺五寸	23 年 8 月 4 日	塔什干城 [25]
雪团花	阿毕里斯	纯白色	四尺七寸、七尺二寸	23 年 8 月 4 日	塔什干城
星文麟	图里拜 [26]	褐色	四尺九寸、七尺三寸	23 年 8 月 4 日	塔什干城

可见，哈萨克左右部八首领献马共分四批，首先为兆惠、富德率部在爱呼斯河附近额卜克特军营接受阿布赛、阿布勒比斯献马，其次霍济伯尔根与喀拉巴拉特闻信同至献马，随后额尔类于巴尔喀什湖以东遇清军单独献马，最后为富德所部在塔什干城接受阿布勒比斯、图里拜、辉格勒德共同献马。

复加详考《钦定石渠宝笈续编》中哈萨克《八骏图》条所载信息，可知郎世宁奉旨所画八骏，皆经清廷君臣特意挑选，即，未遗漏任何一位已归附哈萨克大首领，也未因某首领地位高而多画其所贡骏马，每骏各与进贡首领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哈萨克《八骏图》所要表现的，实际上是哈萨克诸部全部八位大首领归附清朝的历史事实。这一画作从创作伊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

乾隆帝令郎世宁画哈萨克《八骏图》，不但是他喜好文墨兼笼络外藩的外在表现，还因为，“乾隆皇帝的八骏意象与周穆王的八骏逸游形成强烈对比，而哈萨克所贡八骏，也表示这些‘大宛马’是汉武帝所不能及的成就……具有侧重国家意象的一面”。[27]

在乾隆帝统领下，清廷在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前几个月内，完成了“三图一歌”整体的创作。三图间关系，实有必要阐明。兹列表如下：

表二：《哈萨克贡马图》《哈萨克八骏图》《云锦呈才图》一览表[28]

图名	内容	材质色彩	尺寸形式	引首	其他文字或印玺 [29]	大宛马歌题 写	清宫内务府《活 计档》之相关记载
哈萨克贡马图	画哈萨克 贡马图一 卷	宣纸本 设色	纵一尺三寸 五分，横七 尺六寸。 手卷。	御笔：西极 云驰。 鈐宝一：乾 隆御笔。	1) 丙午嘉平御识。 臣董浩奉勅敬书。 2) 臣工恭跋 3) 哈萨克使臣至 令随围诗按语。臣 董浩奉勅敬书。	乙卯新正御 笔	23.10.24 “郎世宁、金廷标 做（照）从前画过 准噶尔贡马图另 起手卷稿”
哈萨克《八骏图》	画哈萨克 所贡八马， 俱清汉文 标名	绢本 设色	纵一尺二寸 五分，横一丈 一尺二寸。手 卷。	无	1) 臣工恭跋。 2) 哈萨克使臣至 令随围猎诗按语。 臣董浩奉勅敬书	臣于敏中 奉勅敬书	23.7.14 用白绢画八骏马 手卷一卷 [30]
云锦呈才图	画八骏	绢本 设色	纵一尺八寸 五分，横一尺 一寸。挂轴。	御笔：云锦 呈才鈐宝一： 乾隆御笔。	轴内分鈐宝玺：乾 隆御览之宝、太上 皇帝之宝、鉴藏宝 玺。五玺全。	臣于敏中 奉勅敬书	23.10.26 云锦呈瑞挂轴一 轴，配做紫檀画斗 云口、檀木楣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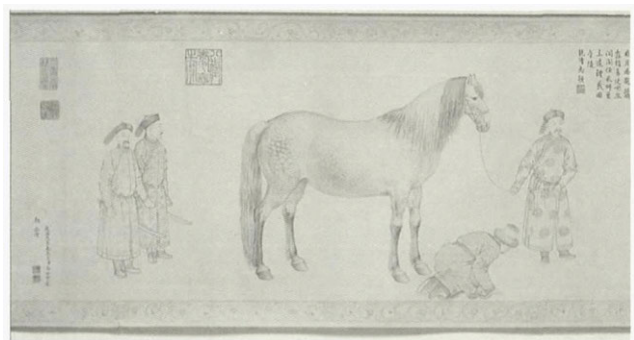
结合上表分析可知：一、此三图形成时间极为接近且都题有《大宛马歌》；二、《石渠宝笈续编》所载哈萨克《八骏图》马匹毛色形态，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云锦呈才图》所画“八骏”虽稍不同但大半近似；三、由满文档案可见，《八骏图》中有三骏进贡首领霍济伯尔根、喀拉巴拉特、阿比里斯在历史上献马仅只一次，此三骏无可替代，各版本八骏图应采用相同原型。由此，可认为《云锦呈才图》所画立轴八骏，应以哈萨克《八骏图》为母本绘成，虽有微小调整，但属问题异构。《云锦呈才图》“变体”的出现，应为内廷因喜爱这一题材而进行的深入挖掘，以求满足清宫君臣群体除手卷展阅外，更为多样化的品鉴欣赏需要。

笔者认为，郎世宁奉命依照实际抵京的哈萨克马匹逐一绘制的哈萨克《八骏图》，成为乾隆二十三年底绘成的《哈萨克贡马图》所见三骏及《云锦呈才图》所画“八骏”原型。标有满汉骏马名的哈萨克《八骏图》对其余二图起到素材作用，《哈萨克贡马图》三骏形象取之其中，《云锦呈才图》则为定本哈萨克《八骏图》之“变体”。

乾隆帝以过去从未附属中国的哈萨克举部归附为创举，以哈萨克马匹入贡为超越历代帝王成就之标志，哈萨克贡马随之具有了象征清朝盛世的意义。在这一意义上，就不难理解同在乾隆二十四年，郎世宁奉旨画哈萨克《八骏图》外，又奉旨画有《哈萨克贡马图》和《云锦呈才图》。哈萨克《八骏图》《云锦呈才图》所绘“八骏”可与历代“八骏”对比，而《哈萨克贡马图》则由于哈萨克使者牵马跪拜与端坐受贡的乾隆帝共同构成图景，更具清朝皇帝抚有四方，外藩向化来归的象征性。《哈萨克贡马图》的创作，是因为《八骏图》题材表现力不足。

三、《哈萨克贡马图》源流及其价值

《哈萨克贡马图》是“三图一歌”整体中的“主图”，关于其画面内容，目前尚未有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从上文《活计档》记载来看，《哈萨克贡马图》以《准噶尔贡马图》为母本，是中国历代宫廷绘画中贡马图题



郎世宁 《准噶尔贡马图》手卷 清乾隆十三年(1748) 绢本设色
纵一尺二寸五分,横六尺三寸五分 法国巴黎人类博物馆



明人摹元周朗 《佛郎国贡马图》 纸本白描 北京故宫博物院

材的延续和新的发展。从乾隆皇帝着装及山石树木来看,该场景很可能是以乾隆皇帝曾经接受准噶尔王公噶勒藏多尔济、哈萨克左部首领阿布赛使者亨吉噶尔入觐的木兰围场伊绵峪,或哈萨克右部使者卓兰等入觐的盘山行宫或南苑围场为基础。

该图画画面右侧,为亭前台阶上着便装的乾隆帝端坐于靠椅上,左右共有五名大臣侍卫扈从,台阶下为两名清朝官员带领手牵三匹进贡马匹的三名哈萨克使者。为首的哈萨克使者手牵一匹白色马匹,向乾隆帝跪拜,在该使者和马匹后方,是另两位准备贡马的站立哈萨克使者,他们牵着一匹纯黑马和一匹红白花马。《钦定石渠宝笈续编》中记载此画:“宣纸,纵一尺三寸五分,横七尺六寸,设色界面,敞榭三楹,

中安黼座,敬绘御容,侍立者四人,阶下引者二人,回人匍伏效马者一、后二回人立鞚以俟”。有学者判断该画为乾隆帝命郎世宁绘左右二部阿布赛等所贡骏马,[31]笔者认为有误,《哈萨克贡马图》所绘马匹人物,实应为哈萨克右部汗阿比里斯使团及所献马匹为主。

因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笔者着重考察画面上行跪拜礼哈萨克使者身份,及他身后白色马匹是以哪一位哈萨克首领名义进贡。从《哈萨克贡马图》左侧文字部分来看,只有紧邻画面的文字与画作书于同一张画卷上,其余文字则是书写在纸张颜色质地不同的后接纸张上。书画同卷上的文字部分,为乾隆二十四年所作御制诗《大宛马歌》,“匍匐牵跪陈墀前”是对画面的描写,即有哈萨克使者牵马跪拜。从《大宛马歌》文字中跪拜场景表述,与《哈萨克贡马图》上呈现画面一致来看,御制诗是对画作中写实画面的纪实表述。与《百骏图》[32]等虚拟构图不同,《哈萨克贡马图》画面中的人物、场景、马匹应各有出处。以下从哈萨克使者派出者、派出时间、马匹毛色等方面进一步确定画面上的内容。

首先,限于哈萨克左部自乾隆二十二年下半年方归附清朝并遣使贡马,哈萨克右部至乾隆二十三年方第一次遣使贡马的客观条件,在如此短暂时间内,郎世宁并没有因同一首领多次贡马而积累大量素材的条件。结合上节三图关系之讨论,《哈萨克贡马图》呈现的马匹形象应选自哈萨克《八骏图》。

参照表一所列八骏信息,并比照《哈萨克贡马图》中后二骏毛色分别为纯黑色和红白花色之情形,因毛色独一无二,此二骏应为小玉兹头目额尔类进贡“繡铁驄”和中玉兹头目喀拉巴拉特进贡“锦云馱”。而“八骏”中毛色为白者有二,分别为中玉兹自称为汗的阿布赛和拥有大玉兹正式汗位的阿比里斯所贡,需加辨别。证之以《御制增订清文鉴》中阿布赛进献“苍龙驥”的对应蒙文名“kōkeloo boro”(青龙青马)和对应满文名“kulutu fulan”的释义“bolo kuluk”(青色神骏),及阿比里斯进献“雪团花”的对应蒙文名“časun čayan”(雪白)和对应满文名“cabgan suru”的释义“der seme šayan kuluk”(雪白的神骏)。可见,阿布赛所进“苍龙驥”实为青色马,唯一的白色马匹是阿比里斯所进“雪团花”。即《哈萨克贡马图》上的三匹马极可能是“雪团花”(雪白)、“繡铁驄”(黑色)、“锦云馱”(红白花色)。

再根据承志和阿依达尔两位学者对军机处满文哈萨克源流档案的最新研究,该大玉兹使团抵京后接受了军机处官员问询,正使卓兰声称阿布赛并非哈萨克



郎世宁 《云锦呈才图》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 绢本设色 82.6×70.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

汗，而仅为苏丹，[33]这一回答极有可能被乾隆帝采纳。说明在郎世宁绘哈萨克《八骏图》时的清廷认知中，八骏进献者中仅阿比里斯具有正统汗身份。加之阿布赛所献马匹在《御制增订清文鉴》满蒙文释义中载为青色之结论，进献白马且具汗身份者仅有右部汗阿比里斯。

考察完毕马匹毛色，及阿比里斯为进献“八骏”首领中唯一汗以后，尚需比对画卷与《大宛马歌》内容是否相符。其内“哈萨布鲁胥向化”说明与哈萨克、布鲁特一同遣使有关；“左右部长及可汗，遣其首领远来献”说明与哈萨克左、右二部首领及至少一位哈萨克汗有关。因而，画卷上的哈萨克使者及

马匹，应与以下三个要素有关：一、哈萨克二部首领献马；二、至少与一位哈萨克汗有关；三、时逢哈萨克、布鲁特共同遣使。

将进献者中符合要求的阿比里斯、喀拉巴拉特、额尔类三位首领与以上条件对照，可见：一、确为哈萨克左、右部都有使者献马；二、阿比里斯作为哈萨克右部汗的身份确定无疑，且与《钦定西域图志》将《大宛马歌》收于“右部哈萨克”条下相符，即画卷以哈萨克右部汗阿比里斯遣使向乾隆帝进献白马为中心展开；三、右部此次遣使，确与布鲁特奇泰鄂托克首领卡拉波托比使者及马匹同至。[34]因而，符合《大宛马歌》中的文字内容。笔者认为：郎世宁《哈萨克贡马图》上匍匐进献雪白毛色马“雪团花”者为右部（大玉兹）哈萨克阿比里斯汗使者，后方等待献马者中牵红白花马“锦云辇”者为左部（中玉兹）头目喀拉巴拉特使者，牵黑马“繡铁驕”者为右部（小玉兹）[35]头目额尔类使者。

从这一结论出发，进一步考察可知：第一，郎世宁所画场景应为乾隆帝首次接见哈萨克右部汗阿比里斯等所遣使团的盘山行宫或再次接见时的南苑围场，[36]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承德避暑山庄或木兰围场行宫。第二，画卷上马匹虽为写实，实为将不同时间到达的使者和贡马置于同一场景内。理由如下：首先，左、右两部使者此时并未同时入觐，当哈萨克右部使者在乾隆帝身边停留期间，并没有哈萨克左部使者在京；[37]其次，这三匹骏马分别于三个时间段到达京城，喀拉巴拉特贡马于乾隆二十二年七月，阿比里斯贡马约为乾隆二十三年九月，额尔类贡马于乾隆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间。郎世宁奉旨特意挑选，将不同时间进献乾隆帝的三匹骏马绘于同一画卷，即达到显示各部来归，又在画卷上呈现出

黑、白、红白花三马毛色巧妙搭配之效。第三，画卷上的各批哈萨克使者与马匹很难同步抵京，应为将先后发生的朝觐与贡马这两件事置于同一时空内。按照清代外藩朝觐贡马时的习惯，为使者先行，马匹另行遣人徐行解送，[38]当哈萨克使者抵京觐见完毕，其首领进献马匹很可能尚未到达京城，此次前来的哈萨克右部使者卓兰等人，于八月从塔什干出发“日行三百里”，[39]仅耗时两月就于十月抵京，因而使者朝觐与献马同时发生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第四，从哈萨克右部乾隆二十三年入觐前后，乾隆帝在已创作六首御制诗[40]的基础上，又下令画《哈萨克贡马图》配以御制《大宛马歌》来看，这次入觐恰逢其时，受到高度重视，引发乾隆帝重构历史叙事的决定。第五、哈萨克使者所行跪拜礼，虽然最符合当时的礼节传统，但已与今天的交往礼仪有别，我们应贯通古今，理解“旧识”与“今知”的差异。第六、该作创作于清廷对哈萨克认识尚未完全定型阶段，体现出乾隆二十四年前后这一历史区间的清朝西域认知，其后不到一年，清廷对哈萨克各部首领地位的认识又发生重大转变，若缺乏对满文史料和美术史史料的贯通利用，将难以理解这一画作创作及欣赏的“原境”。

结语

综上所述，《哈萨克贡马图》以实际到过京城、代表其首领的哈萨克左、右部使者向乾隆帝进献马匹为创作出发点，但并未拘泥于某一次完全真实的场景，而选择西哈萨克来归时阿比里斯汗使者进献白马“雪团花”为中心进行构图，同时出现了不同批次的使者和哈萨克骏马，达到增加画面美感兼承接并发展中国历代宫廷贡马图题材的目

的,最终与《大宛马歌》文字相符以体现政治意图,构造出一个代表整个哈萨克部族向清朝皇帝内附贡马的壮丽图景。图卷上将分数批到来的使者和马匹加以特定组合,以满足御制诗内容的情况,辅之以内务府《活计档》记载,令笔者推断存在哈萨克右部遣使朝觐在先,次有哈萨克《八骏图》定稿,复有御制诗《大宛马歌》创作,终有郎世宁画《哈萨克贡马图》、续有变体《云锦呈才图》问世的时间序列。

《哈萨克贡马图》、哈萨克《八骏图》《云锦呈才图》《御制大宛马歌》皆创作完成于乾隆二十四年前后,[41]具有极高的关联性。与通常的即时创作御制诗不同,《大宛马歌》是在清军平定准噶尔,又陆续收服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诸外藩次年创作的,具有总结性质,如“辟疆勤远非本意,人归天与宁可捐,作歌自警示后昆”,即强调了清朝西域武功顺天应人,自然天成的一面,又是对西域局势的总结,乾隆帝在《大宛马歌》中对比前朝,突出本朝未曾招徕,极边外藩即纷纷向化来归的盛世图景,这种超越汉唐的心理状态加上文治武功,正需要“一图胜千言”的《哈萨克贡马图》来给予朝臣和入觐使者直观印象,也体现了乾隆帝构建国家意象的政治意图,正因为乾隆帝要以哈萨克归附为契机打造全新的国家意识,因而才会有为《大宛马歌》而创作的《哈萨克贡马图》及相应的哈萨克《八骏图》之举。

伴随着清朝与哈萨克关系的深入发展,自乾隆至嘉庆朝,从哈萨克诸部获得贡马成为清朝定制。如塔尔巴哈台贡马,“塔尔巴哈台岁进上用马匹……乾隆五十一年,大学士公阿桂等奏明,嗣后不必专员恭进,着交年满差便顺带进京,嘉庆元年参赞大臣乌尔乌逊奏准,贡马启由口外草地行走”。[42]

这样一种哈萨克部落以马匹为代表物,被接纳入清朝外藩文化体系中,是乾隆帝“中外一家”思想的体现,以及清朝与哈萨克能够更好维持“大国-藩属”关系的文化基础。哈萨克与清朝间延续百年的缎马贸易活动,在清代边疆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期间进贡的哈萨克骏马亦为不可忽视的文化沟通与交流媒介,哈萨克部族对马匹的重视,与清朝立国之本的“国语骑射”对马匹的重视具有共同点,使得哈萨克贡马拥有其他外藩部落贡物所得不到的恩宠。乾隆中期清哈关系的开拓,为清朝与中亚关系史研究留下丰富遗产。《哈萨克贡马图》在回应中国历史上的“神骏”题材美术作品的同时,还连接了康熙乾嘉四帝的西域想象和西域诗赋,不但具有反映朝觐礼仪作用,更具有政治与文化意义。

清朝与哈萨克关系可形象比喻为横跨万里的“哑铃”结构,其实质为“中央与边疆”关系。在以京城为中心的清中央发生的大量艺术创作活动,及清朝内部发生的观念、认识改变构成哑铃的东端。本文为这一“哑铃”结构的东端提供史论支持。同时,体现出满文档案和美术史资料的结合对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注:

[1]《昭陵石马歌》:“在昔穆王八骏追云霞,耄荒忘返天之涯,太乙况汉天马来,乐府曾闻产渥洼。”《乾隆御制诗初集》卷18,第12页。

[2]《册府元龟》卷42《帝王部·仁慈》,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册,1960年,第477页。

[3]该作虽画拂朗国使者向元顺帝贡献欧洲马匹,但据揭傒斯题《天

马赞》及群臣赞,都将该马附会为汉武所求大宛天马,见徐英:《从佛郎国献天马看蒙古人的尚马情结》,《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王大方:《元代〈拂朗国贡马图〉识略》,《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年第2期。

[4]参见林士铉:《玉质纯素·隐有青文——记郎世宁画十骏图如意图的绘事特色》,《故宫文物月刊》391刊(2015年10月),第40-49页。及其待刊论文:《乾隆朝清准关系的重构——〈准噶尔贡马图〉的绘制与准噶尔来使仪注》。

[5]该画作左下方写有“臣郎世宁恭绘”,并钐印二方“臣世宁”“恭画”。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在华51年间,受康熙乾隆三帝信任,留于内廷作画,尤擅画人物、马匹等。参见鞠德源、田建一、丁琮:《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兼在华耶稣会士史事稗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2期。

[6]现存法国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Musée Guimet),卷首有乾隆帝御题“西极云驰”。由《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藏一八》所见“郎世宁画《哈萨克贡马图》一卷”条,可知该画作纵一尺三寸五分,横七尺六寸,正式名称为《哈萨克贡马图》。吉美博物馆网址: <http://www.guimet.fr/en/home/92-anglais/collections/china/400-kazaks-offering-horses-in-tribute-to-the-emperor-qianlong> [2017年4月10日登陆]。在对郎世宁作品整理中,有英国郑德坤收藏《大宛贡马图》,被今人认为是伪作。笔者亦同意伪作说,首先,该图未收于《石渠宝笈》名录,其次,与乾隆帝谕令绘制画作命名习惯中“诗文怀古而图绘当世”的特点不一致。

[7]《御制大宛马歌》:“今之哈萨昔大宛,峤山神种古所传;乌孙中阗阻声教,攘为己有曾闲贡;哈萨布鲁胥向化,无他为厩致敬虔。驷

裹汗血实方物，左右部长及可汗。遣其首领远来献，却之失望厚赉还。駉駉骝骝类实夥，葡萄牵跪陈墀前。为龙为驂各天矫，雄姿逸态英且闲。流珠喷玉谁则见，奔霄追电有必然。往者贰师求善种，徒劳数万恶少年。致一二耳犹艳调，奚称归德开远门。辟疆勤远非本意，人归天与宁可捐。人归天与宁可捐，作歌自警示后昆”。收于《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71页。

[8]哈萨克汗国头克汗于1718年逝世后，出现大、中、小三玉兹长期分立局面，清朝称之为“右、左、西”三部，参见拙作：《清朝与哈萨克汗国首次通使若干问题再探讨》，《清史研究》2016年第1期。

[9]马克·马西罗：《重估郎世宁的使命——将意大利绘画风格融入清朝作品》，毛立平译，《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研究郎世宁中西合璧绘画风格的形成；曹天成：《瘦马及其位置——关于郎世宁画作中一种形象的研究》，《美术研究》2012年第1期，探讨郎世宁所画《百骏图》《八骏图》中瘦马形象应源自西方美术世界。

[10]《哈萨克贡马图》题跋字数、盖印数量都远胜其余二图，且绘有御容，并有乾隆帝御笔所书《大宛马歌》全文，体现出该作中心地位。

[11]冯明珠较早提出《云锦呈才图》所画可能为哈萨克马，参见《骏马天山来——谈郎世宁所画的骏马》，《故宫文物月刊》2卷7期（1984年10月），第58-65页。林士铉推进了哈萨克《八骏图》研究，参见《乾隆时代的贡马与满洲政治文化》，《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四卷第二期，第51-108页。周轩详尽分析《大宛马歌》，参见《献马无过聊表悰，同舟真是大联情——谈乾隆皇帝关于哈萨克的诗篇》，《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

1期。

[12]即西哈萨克，满文中“wargi”一词兼有“西”“右”二意，在随后形成的汉文文献中出现“西哈萨克”“右部哈萨克”“哈萨克右部”三词混用现象，实为同意异译。

[13]《参赞大臣富德等奏为哈萨克回子等均已归诚事折》，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初四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收于《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一）》，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第132-133页。本文所用满文档案，均为笔者译。

[14]《参赞大臣富德奏报将哈萨克布鲁特及领队大臣侍卫等进贡马匹择优送京事折》，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初四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收于《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一）》，第134-135页。

[15]林士铉：《乾隆时代的贡马与满洲政治文化》，第73页。

[16]辉格尔德之名不在上引富德奏折内，因其在西哈萨克地位处于阿比里斯汗和图里拜巴图尔之后，遂在只列二名时被略去。此三人各献马一匹，正合西哈萨克二人献马三匹之数。

[17]满文abilis的另一种汉文音译，一般译为“阿比里斯”。

[18]阿比里斯汗此后未再遣使，应与此次西哈萨克主使卓兰至京后向军机处官员所言阿比里斯并无实权有关，参见承志、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满文文献记载的哈萨克汗世袭源流》，《第二届国际满文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无锡，2016年。

[19]西域贡马命名进入辞书情况，参见林士铉：《乾隆时代的贡马与满洲政治文化》，第80页。亦见《御制增订清文鉴》《五体清文鉴》。

[20]笔者据以下史料整理：《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奏哈萨克阿布赉遣使归附折》，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23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5-424页；《定边将军兆惠等奏侍卫纳兰图赴哈萨克巴图鲁额尔勒处商谈捉拿哈萨克锡喇折》，乾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29册，第128-131页；《定边将军兆惠奏报哈萨克额尔雷归还其属下抢夺之粮餉请奖赏折》，乾隆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30册，第389-395页；《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42，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丙寅条；《清圣祖实录》卷555，乾隆二十三年正月辛亥条；《石渠宝笈续编》《石渠宝笈三编》。进贡首领、骏马信息出自《石渠宝笈续编》，进贡时间、献马地点出自满文奏折档案。《石渠宝笈》所载哈萨克八首领名音译，与其他文献稍异。

[21]中玉兹汗阿布勒班毕特之子头目苏丹阿布勒比斯。

[22]中玉兹阿巴克塔可热鄂托克头目巴图尔霍集博尔根。

[23]中玉兹首领阿布赉。此时以向清朝自称汗，后成为哈萨克三部总汗。

[24]小玉兹汗阿布勒海尔之子额尔类。据满汉文档案，其余七首领在哈萨克《八骏图》《哈萨克贡马图》绘制前均有明确贡马记载，唯额尔类贡马情形难寻。彼时，额尔类接到已归附清朝阿布赉之邀约文书，前来巴尔喀什湖至伊犁间清朝界内攻掠准噶尔叛军。满文档案载有额尔类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六月两次与清军相见详情，但均未提及献马。笔者推测，缺载可能有二，或因前线将领军务紧急而献马之事琐碎，且确知额尔类非大头目，因而未在奏折内提及，仅将领侍卫等回京面圣时口头汇报而无文字；或额尔类虽未实际献马，但郎世宁画哈萨克《八骏图》时为足八首领之数，经乾隆君臣指示，将手持清军文书、箭只为凭行走办事之已归附

额尔类计入其中。

[25]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市。

[26]大玉兹巴图尔图里拜,掌握实权,乾隆二十三年哈萨克右部使团主使卓兰为其子。

[27]林士铉:《乾隆时代的贡马与满洲政治文化》,第90页。

[28]笔者据《石渠宝笈续编》《石渠宝笈三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整理而成。

[29]不同于第三图印玺记载出自嘉庆朝《三编》,前两图因出自乾隆朝撰《续编》,印玺数目记载不全,此表遂未收录前二图印玺。比照三图文字部分,前二图印玺数皆应在第三图之上。

[30]可知二十三年七月,乾隆帝已着手安排画师准备哈萨克八骏图题材,此“八骏马手卷”奉旨时间在哈萨克右部归附前,仅及包含最终定本哈萨克《八骏图》中前五骏和其它三骏,哈萨克右部归附方促成最终定稿问世。该白绢手卷应为定本哈萨克《八骏图》稿本之一。

[31]汤斌:《乾隆时期的西洋画师笔下的藩部朝贡鸟兽图》,《紫禁城》2011年第1期。

[32]曹天成:《郎世宁在华遭遇及其所画瘦马研究》,中央美术学院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该文第143-173页考察郎世宁所绘《百骏图》与《八骏图》《贡马图》,认为前者为郎世宁创作的构造场景,后者记录历史事件,宣示外藩,为写实画作。

[33]承志、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满文文献记载的哈萨克汗世袭源流》,论证此时哈萨克社会内部尚未公认阿布赉为汗。

[34]《参赞大臣富德奏报将哈萨克布鲁特及领队大臣侍卫等进贡马匹择优送京事折》,收于《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一)》,第134-135

页。

[35]哈萨克小玉兹远离清朝边界,临近里海,为清朝认识最晚,直至乾隆二十七年才首次朝觐,后清廷将其与“左部”“右部”并列,命名为“西哈萨克”。但乾隆二十四年时清廷仍延续先前错误认知,将小玉兹汗之子额尔类归类为哈萨克右部。

[36]《皇帝于二十五日驻蹕南苑赐宴右部哈萨克使臣筵宴等事》,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初五日,《起居注》,收于《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一)》,第163页。

[37]考察《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一)》第163-183页《起居注》,右部哈萨克使者在京活动期间,无左部哈萨克使者在京。

[38]如此次使者即先于马匹出发:“以上马匹已收悉,与使者同往已不可行,欲另派人送往……将领队大臣、乾清门侍卫等所进马匹,及布鲁特、哈萨克等所进马匹一同,派精干官军解送,随后出发”。《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一)》,第134-135页。

[39]《御制右部哈萨克及塔什罕城回人布鲁特部首领胥来觐谒至山庄曲宴示恩点笔成什》内“向心心殷身忘倦”注释为“侍卫携之乘传而来,日行三百里,历二月之久方到,皆不言劳且欢忻踊跃,称真从日入处得到日出处也”。收于《西域图志校注》,第570页。清中叶加急军报换人换马日行六百里,从伊犁到京城尚需十七八日,塔什干又远在伊犁以西数千里外,尚能两月赶至京城,说明此次哈萨克右部使者沿驿站不断换马前行,速度极快,不同于贡马解送需严遵不令疲病瘦弱徐行原则,属人、马分行。

[40]分别为《御制右部哈萨克归化遣使朝贡诗以记事》《御制将之盘山驻蹕汤泉行宫作》《御制右部哈萨克及塔什罕城回人布鲁特部首领胥来觐谒至山庄曲宴示恩点笔成什》《御制南苑行围杂咏》《御

制赐哈萨克布鲁特等宴即席得句》

《御制南苑赐哈萨克布鲁特塔什罕回人等观烟火灯词》。

[41]《西域图志校注》,第571页,《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藏卷一八,载《大宛马歌》《八骏图》《哈萨克贡马图》创作时间为乙卯年,即乾隆二十四年。但据《活计档》及御笔《大宛马歌》题于新正日来看,以上图文皆应完成于二十三年年底。

[42]《塔尔巴哈台事略》卷三《贡马》条。

(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清代乾隆时期与哈萨克诸部关系研究”[项目号2017-GMH-019];新疆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十八世纪哈萨克首领阿布赉汗研究”[项目号17BZS069];新疆社科联治疆方略重点项目子课题“构建马克思主义新疆历史史料体系研究”[项目号17SKLZJFL003];新疆智库委托项目子课题:“影响当代新疆社会稳定的历史文化因素研究”的阶段成果。撰写中,林士铉、周轩、黄小峰、张长虹、温拓等学者提出宝贵意见并提供艺术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郭文忠
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历史学博士
830046
(本文责任编辑 张涛)

明清贡马图

- 1 明人摹元周朗 《佛郎国贡马图》卷 30.3×134 cm 纸本白描 故宫博物院
- 2 (清) 郎世宁 《哈萨克贡马图》手卷 清乾隆二十三年 (1758) 底 宣纸本设色 45.5×269 cm 法国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



1



2

